



# 上海社会科学院

##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 2013年1月30日第2期(总第147期) 上海市连续性内部资料准印证(B)0225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 抓住新机遇 聚焦新突破 全面规划发展新蓝图

#### ——我院召开2013年工作务虚会

1月24日,我院2013年工作务虚会在上海社科国际创新基地召开,会议紧紧围绕“抓住新机遇,聚焦新突破,全面规划发展新蓝图”的主题,深入讨论我院2013年工作。会议畅所欲言,集思广益,并达成初步共识。市委副书记、上海社科院院长王战、院党委书记潘世伟出席会议并作讲话。

王战充分肯定了本次务虚会的作用,要求2013年度的工

作报告和要点要吸收大家的意见和建议。他指出,全院上下要有忧患意识和机遇意识,要充分认识到来自高校、政府科研机构的竞争与严峻挑战。但同时要珍惜机遇,不失时机地抓住五年经济危机带给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机遇,抓住改革带来的十分难得的机遇,利用好上海先试先行的机遇。他强调,在智库建设和学科发展双轮驱动战略实施过程中,要辩证处理好两者之间的互动,

快速提升我院学术影响力。他希望要扎扎实实贯彻落实好务虚会精神,各项工作要见事见人。

潘世伟在动员讲话中指出,在过去三年的发展周期中,我院确定了智库建设和学科发展的双轮驱动战略,在2+3+3工作布局下,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明确每年的工作重点,齐心协力,努力工作,在大局意识、管理执行、责任意识、精神状态、学术氛围等方面都有显著的改观,智库建

设和学科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科研工作高位运行。他要求全院上下要认识和把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形势,在巩固已有成绩的基础上,抓住十八大开启的窗口期,聚焦重大突破,注重协同创新,谋划未来发展。

会上,党委副书记洪民荣,副院长黄仁伟、叶青、谢京辉、王振就各自分管工作发表了意见,各组召集人分别汇报了分组讨论情况,王玉梅、屠启宇、周

冯琦、权衡、于蕾五位同志在大会上分别作了交流发言。

各研究所所长、副所长,直属单位和机关处室负责人,党总支和直属单位党支部书记、副书记,研究所办公室主任,院工青妇负责人,院民主党派负责人,全院正高级岗位人员及部分青年骨干近200人参加了会议。

(党政办)

#### 王战在院2013年工作务虚会上的总结讲话

2013年1月24日

同志们:这次务虚会,整整开了一天,上午潘书记做了动员,一些同志就社科院的亮点作了交流发言,各组讨论也比较热烈,召集人代表各组发言。应该说,这次务虚会紧紧围绕“抓住新机遇,聚焦新突破,全面规划发展新蓝图”的主题,紧紧围绕事关我院发展的一些重大挑战和问题,畅所欲言,积极思考,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达成了初步的共识。这些意见和建议,我们将吸收进2013年院重点工作计划,在春节后召开的院工作会议上下发,并在全年工作中切实加以贯彻落实。刚才,分管领导都谈了自己的想法,我最后再谈三点意见:一是要有忧患意识和机遇意识;二是要实现双轮互动,提升学术影响力;三是关于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

##### 一、既要有忧患意识,更要有机遇意识

韩正书记在十届上海市委三次全会上指出,没有忧患意识是最大忧患。我想对于社科院来说,也要有忧患意识,要充分认识到高校、政府科研机构的竞争优势对我们形成的严峻挑战。高校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高校在文科方面的科研投入越来越大。《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改革和发

展规划纲要》要求教育经费投入应当占到GDP的4%,教育部也制定并下发《关于深入推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意见》及其相关配套文件,对重点基地建设、研究成果评价、“走出去”战略等都作了全面部署,力度很大。不仅上海一批“985”和“211”工程的高校在科研投入方面大大高于我院,上海地方高校最近也得到市教委的大力支持,经费增加很快。这还不包括教育部在高校推出的协同创新计划。高校目前在核心科研成果方面的奖励很大。充足的科研投入为科研激励和人才吸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二是高校加强了应用对策研究。高校近年来不断利用学科优势和人才优势来强研究,各种专业研究团队顺势而生。例如,复旦大学加强了发展研究院的功能,华师大成立了新沪商研究中心、上海财大瞄准全球500强企业成立“500强企业研究中心”。三是高校在科研核心指标方面的竞争优势越来越大。从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数看,2012年,虽然我们从2011年排名全市第8位的不利局面中有所改善,但我们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高校在文科方面的科研投入越来越大。《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改革和发

大项目在的所有项目仅为28项。值得注意的是,后面的追兵正纷纷赶上和超越。

与此同时,政府研究机构的竞争优势也在加强。政府研究机构拥有贴近决策的优势。例如,市府发展研究中心不仅成立了战略研究所,新办了《科学发展》杂志,每年进行决策咨询评奖和对外发包课题,与全市众多高校和科研机构建立合作关系,举办各种经济学家论坛,其立项、发包、集成、宣传形成了有效的智库成果生产链条。市发展改革研究院在决策咨询研究方面也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不断推出有影响的重大课题,并形成具有品牌效应的论坛,成立了能源交通研究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则在国际化方面成绩斐然,对外学术交流和对外关系拓展非常活跃,特别是一批年轻人有着更多的“走出去”机会和更强的国际对话能力。

当然,在强调忧患意识的同时,我们更要有机遇意识,忧患和机遇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有了强烈的忧患意识,我们才会更珍惜机遇,更会在机遇来到时不失时机地把握和利用。第一个机遇是五年经济危机带给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机遇。危机对实体经济、对社会是有影响的,但对做研究来说(下转第2版)

#### 潘世伟在院2013年工作务虚会上的动员讲话

2013年1月24日

同志们:今天我们召开院2013年工作务虚会。会议的主题是“抓住新机遇,聚焦新突破,全面规划发展新蓝图”。务虚会非常重要,为全年的工作定调。务虚是为了更好的务实,起步是为了更好的发展。我的动员讲三点:一讲成绩,二谈形势,三提目标。

##### 一、近三年我院发展取得的成绩

2012年刚刚过去,我们按照时间节点和任务分工,基本完成了各项工作,从而实现了前三年作为一个周期的阶段性安排。2010年,考虑到实际情况和现有基础,我们明确了智库建设和学科发展双轮驱动的战略,2011年着力抓好管理、教学和国际化工作,2012年,在前两年基础上明确了推进研究所体制机制创新、人才队伍建设和提升核心科研竞争能力这三个重点工作。总的来看,前三年一个周期就是通过2+3+3的三年工作布局,不断推动完善我院智库形态和功能,提高学科的合理布局和竞争力。在全院特别是各所共同努力下,我们保持了非常良好的发展态势。

在智库建设方面,首先,我们将战略性、前沿性的重大课题置于对策应用研究的

核心位置。在服务国家战略层面,2011年我院学者承担了中共中央外办牵头组织的《中国和平发展白皮书》的研究和起草工作,2012年又担负起商务部《经济全球化新形势下我国对外开放战略专题研究》。在服务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我们承担了上海“十二五”规划、上海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世博后软资源”等重大课题研究。2012年我们又承接了市重大课题《新兴产业发展态势、影响及对策综合研究》、市委交办的《执政方式现代化》、市委宣传部交办的《哲学社会科学自主创新》等重大课题研究。此外,我们有多位学者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常委会和市委常委会学习会作专题辅导报告。我院学者观点不断见诸于《求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等重要报刊,可以说,我们做到了重大问题上、重要活动中有社科院的声音,大大提高了我们的智库知名度和影响力。

其次,抓好智库主导产品。我们陆续扩大蓝皮书系列。前年我们增加了国际城市、法治和传媒蓝皮书,2012年我们又新增文学蓝皮书。蓝皮书的前期组织工作和选题更加规范化和程序化,蓝皮书的质量不断提高。

去年,国际城市蓝皮书、经济蓝皮书和社会蓝皮书分别进入全国重点蓝皮书行列。

专报工作提供决策咨询服务的能力不断提升。近三年我们得到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的批示数量逐年提高。2012年,《上海新智库》系列专报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领导批示13份,其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批示5份。《国际问题》专报获得中央领导批示1份,《舆情信息》获得中央政治局常委批示6份,市委主要领导批示2份。

再者,坚持开门办院,我们和高层、条线、区县、市外的合作不断深化、拓展。在做实原有合作平台基础上,2012年,文化部“国家对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落户我院,成为我院首个国家级科研基地;与中国社科院的合作得到深化,中国社科院当代所在我院成立国情调研基地,合作开展“当代上海”和“纵观上海”两大系列课题研究。与江苏海门共建“沿江沿海发展研究基地”,也是2012年我们与其他省市在地方经济合作方面的又一成果。

在学科发展方面,首先,各级课题立项增多。近几年国家和市级课题的中标数量整体呈上升趋势,2009至2012年的这四年间,我们共获得各类国家项目97项,(下转第2版)

(上接第 1 版王战的讲话)

确实是巨大的机遇。俗话说乱世出英雄,我们也可以说危机出思想,因为危机凸显了问题,而找出对现有问题的解决方法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通过问题导向找出解决方案,这对于专家学者是大有可为的事情。经济学重大理论的出现往往是在新的危机出现后,这说明危机对已有理论的否定会催生新的经济学说。第二个机遇是改革的机遇。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很多新的思想、新的观点、新的判断、新的提法,需要我们做深化研究。十八大以来,中央新的领导班子推进改革速度很快,如果我们理论上不能跟进的话,那么我们会落后于改革实践。因此,我们必须抓紧研究十八大报告中各种新的论断,必须抓住改革带来的研究机遇,迅速组织力量,形成我们对十八大报告的理论回应,提供改革实践的决策咨询观点。第三个机遇是上海先试先行的机

遇。中央要求上海先试先行,要实现“四个率先”。上海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在新一轮改革攻坚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全国其他地方还没有遇到的问题。上海社科院必须为上海的先试先行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咨询。但如果我们不能提供有说服力的理论观点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那么我们就很难在上海的先试先行中发挥我们应有的作用,就不能通过“有为”达到“有位”,我们就会被边缘化。因此,我希望各个所要从最坏处着想,要从最好处努力,把忧患意识和机遇意识结合起来。

## 二、要在双轮驱动战略中做到学科和智库的互动,迅速提升学术影响力

我们提出智库建设和学科发展双轮驱动,两个轮子一起转,在双轮驱动过程中如何做到双轮互动,这对于提升学术影响力非常关键。智库建设和学科发展是

社科院发展的两个方面,“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两者不可分割。这个战略实际上和社科院的定位是紧密关联的。社科院是介于高校和政府科研机构之间的研究单位,相对于政府科研机构来说,我们学科比较齐全,理论研究比较强;相对于高校来说,我们更靠近实践,更贴近政府,对现实问题比较了解。这是我们的比较优势。因此,我们发挥这个优势,注重智库建设和学科发展,要在研究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有学理支撑,同时要将理论研究充分运用到实践中去。双轮互动就是这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我们要形成两者之间的良性关系,不能一个轮子过快,一个轮子过慢。如果两个轮子能很好的协调和配合,那么我们双轮驱动战略就有可能实现,社科院就有可能形成相比于高校和政府机构的研究优势。

2013 年是十八大的开局之年,对于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也是 30 年一遇的窗口期,机不可

失。我们必须团结奋斗,紧紧抓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这一深化研究主线,通过提升整体力量形成社科院的学术影响。院所要进行协同,所与所之间要进行合作,要跨学科研究中国的问题,从而逐渐形成有影响的社科院学派。当然,我们强调的理论研究不是纯粹的本本研究,而是要善于从现实问题中提炼观点,形成具有影响力的理论框架。与此同时,我们要针对现实问题和热点问题开展重大问题研究,特别是前瞻性、战略性的研究课题,发出社科院的声音。各所要将本所的研究特长和学科布局与现实课题研究结合起来,要能够提供决策参考。

## 三、关于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

我们在不同范围和层次开了三次务虚会,谋划 2013 年和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间的社科院发展,这对于认清形势,统一思想,凝

聚共识,完善思路,推动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但务虚不是空谈,不是走过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我们要见事见人。见事要抓课题,搞好科研。对于院长来说就是要抓研究题目,抓各种课题的讨论,抓课题的研究成果。

但做课题不能见事不见人。资深研究人员要千方百计留住,他们对社科院发展很重要。与此同时,要培养年轻人,通过给年轻人压担子,让年轻人在课题研究的摔打中成长。对年轻人关键时候扶一把,不仅要给予物质奖励,也要给予精神鼓励,报纸要宣传、推动。

务虚会和工作会议结束后,我们如果能够把需要研究的课题逐一落实,并在落实课题当中见事见人,使社科院形成一批学科带头人和学术梯队,那么我相信,社科院的工作是一定能够搞得更好的,而这正是最近要求我们的,我想就用韩书记的这句话作为今天讲话的结束语。

## (上接第 1 版潘世伟的讲话)

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11 项,重点项目 12 项,一般项目 22 项,青年项目 39 项;4 年共获得上海市课题 148 项,其中哲学社会科学课题 109 项,决策咨询研究重点(公开招标)课题 17 项,市科技发展基金软科学研究项目 22 项。应该说,纵向比,成绩还是非常喜人的,特别是国家重大项目不仅在 2009 年取得零的突破,而且连续 4 年不间断,特别是 2012 年拿了 5 项,在上海也是名列前茅的。

其次,社科评奖成果增多。近几年我们受到高校和其他科研机构的严峻挑战,但整体看我们保住了我们应有的位置,并在获奖质量上有所提升。2012 年我院在上海市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评奖中获得优秀成果奖 17 项,其中: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7 项,三等奖 7 项;内部探讨奖 9 项;网络理论与宣传奖 7 项;获上海市第九届邓小平理论和宣传优秀成果奖 10 项,其中二等奖 7 项,三等奖 3 项。第八届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评奖,我院共获得 15 项,其中: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6 项,三等奖 7 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一位 70 后和一个 80 后的青年科研人员获得一等奖,我院青年科研人员获得重要奖项取得历史性突破,显示科研队伍后继有人。

再者,论文发表也持续增多。我们更加重视院外刊物的论文发表,近几年发表的论文质量不断提升,这也是我们市级评奖能够保有我们竞争力的重要原因。去年我院在核心期刊共发表论文 545 篇,比 2011 年增加了 70 多篇。其中,院外甲类刊物有 88 篇。黄仁伟在《求是》杂志发表重要论文《中国道路的历史超越和国际解读》,凸显我院专家在重大问题上的学者声音。

在重点工作推进落实方面,首先,在科研核心竞争力方面,我们形成了导向明确的考核机制,建立了相应的激励机制,调动了研究

所的科研积极性;其次,在深化研究所体制机制改革方面,我们以五个新建研究所为载体,推行全员公开招聘上岗,构建责权利相一致的管理体制,做到干部任用能上能下,人员流动能进能出,科研岗位能高能低,全院上下的责任意识和竞争意识进一步增强;再者,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我们进一步明确了人才是立院之本的理念,形成了“人才队伍建设三年行动计划”以及五个配套文件,分层次、分阶段、分阶段的人才引进和培养更为细致有效,资源配置和人才培养更加匹配。全院其他工作,无论是党建还是日常管理,也都保持了非常良好的态势。

总体来看,过去一年大家都保持了很好的精神状态,全院形成了工作的有效布局,并努力抓好重点工作的突破。这些成绩得来不易,是全院共同努力奋斗的结果,我们要珍惜这些成果,爱护目前总体上呈现的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我们要看到发展,看到成绩,要振奋精神。

## 二、社科院发展面临的形势

社科院未来发展面临什么样的形势?我们可以从不同层面进行思考。

首先,就国家层面而言,党的十八大的召开,开启了中国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有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我们思考和研究。比如,在主流理论建设方面,十八大后中央非常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而且把它作为今后一段时间第一位的任务。可以肯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结构的研究会进一步深化,无论是在框架上的实践形态、理论形态、制度形态这三个形态,还是在操作上的总依据、总布局、总任务三个层面,以及它内涵上的八个核心要素,都是需要努力思考和研究的重大课题。特别是十八大以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主流理论作更好的研究,更好的表达,更好的传播,我们理论工作者有着重要的担当。

我们还面临其他一系列问题的挑战,如何解决好过去怎么看,现在怎么做,将来怎么样的问题?如何用历史回顾、国际比较、事实论证等方法来回答人民关切的问题?如何把理论研究和宣传转化为各级领导干部的理论素质,转换为人民群众的感情认同、思想认同和政治认同?如何解决好目前重大问题上缺乏共识的现象?如何解决好深层次理论上的一些分歧?如何克服空洞说教、低效果的宣传这样一些理论领域的形式主义现象?这都需要我们作更多努力。

比如,在发展实践方面,我们面临的挑战更多,如何认识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新的变化?如何准备进行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都是十八大报告提出的要求。还有,如何寻找十八大以后发展的新的红利?如何真正实现五位一体的整体性发展?如何在转变发展方式方面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如何以权利约束为核心,设计、酝酿和启动更为深刻的政治体制改革?如何更好地加快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构建一个更加公平、更具活力的现代社会?如何在修复环境方面有重大进展?如何以作风转变遏制腐败为突破口,强化执政党的纯洁性?如何全面推进执政党现代化的建设?所有这些都更需要我们提供更多更好的先进理念、政策设计、解决方案以及发展战略和相应的国际经验。

其次,就上海层面而言,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如何更加具体化,更具操作性?“四个中心”任务怎么实现整体性突破?包括优秀人力资源、技术创新,更高生产效率、充满活力的创意等新的发展要素,如何尽快培育和集聚?所有这些都非

常迫切的需要我们给出准确的回答。在思想文化方面,最近召开了上海思想宣传工作会议,韩正书记提出了如何形成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大思路、大举措和大规划,如何使文化主体更加丰富,文化环境更加优化,文化法制更加健全,文化形势更加多样,文化人才队伍更加壮大?同样急切的需要我们贡献自己的智慧和思想。

最后,就哲学社会科学自身发展而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自主创新正在启动和深化。因此,如何摆脱外部知识系统大规模引进所形成的路径依赖,如何克服近年来学术活动规模总量速度扩张而出现质量下降的短板?如何面对高校等学术活动行为体日益强大的竞争?如何加快社科院传统的体制机制改革,推动我们学术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这些课题也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挑战。

因此,今年是很明显的理论创新的机遇期,政策供应的窗口期,知识需求增长的加速期。社科院工作大家一定要形成共识。各项工作的推进不能停,不能慢,也不能散。我们如果不把今年的工作做好,可能会失去机遇,失去优势,失去未来。所以我想务虚会在对形势的判断上,大家一定要形成共识,要有共同的判断。我们必须顺势而为,必须乘势而上。

## 三、2013 年工作的一些基本设想

今年的工作要点已经发给大家。社科院的日常运行,日常管理,任务异常繁重。我们有 17 个研究所,既要生存发展,还有有那么多的学科建设需要努力推进,以及很多智库产品需要进一步的展培育。新的一年,钱怎么用得更好,事怎么做得更好,人才怎么更好的成长等诸多问题,任务非常艰巨。概括起来讲,今年的工作重点主要有三个。

第一个工作重点就是要继续

巩固发展成果。我们要延续过去三年的发展思路,把今年的一些重要工作向前推进。无论是科研核心竞争力的建设,院所管理的强化,还是已确定的国际化、研究生教育和人才队伍建设的三个三年行动计划,都要下很大的工夫。对于核心竞争力和综合竞争力要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使之更加科学化、合理化。去年年底开始的中层干部竞聘上岗,一些同志还有着这样那样的想法,这方面还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体制机制改革我们要推广试点经验,特别是研究室的整合提高要在全院范围进行探索和突破。所以,今年工作的重点就是继续深化改革,落实好前三年的行动计划,巩固已有发展成果,这是今年工作一个重要的着力点。

第二个工作重点就是要聚焦重大突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是政策供应的窗口期。围绕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围绕新一届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对上海发展的一些谋划,我们要聚焦一些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院所协同创新,在若干问题上形成有份量和更大影响力的智库成果和学科成果。

第三个工作重点就是谋划未来的发展。2013 年,我们将启动大规模的调研,要对社科院下一个 3-5 年的发展形成总体规划,这项工作我们确定为创新工程。怎样对创新工程进行整体设计,以及提供更好的资源配置和政策配套,需要集中全院上下的智慧,形成新的行动纲领和工作举措。

总体上来说,2013 年的工作,需要院所两级共同努力,需要所有科研人员的积极参与。社科院发展的主体是广大科研人员,是各个研究所,所以,在年的发展思路、大政方针和具体举措上,希望能够在这次务虚会上形成共识。

# 行者的视野和坚持

## ——访宗教所副研究员吴雅凌

上海市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于日前揭晓，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吴雅凌的《神谱笺释》获得了著作类一等奖。此前不久，她还荣获了院第八届“张仲礼学术奖”（2012年）。近日，她接受了本报的书面采访，讲述了《神谱笺释》的撰写历程以及一路行走于中西文明之间的所感、所思。

1. 院报：能否请您介绍一下《神谱笺释》的内容和研究过程？

吴雅凌：赫西俄德是古希腊第一位有名有姓的诗人，也可以说是欧洲第一位诗人。他生活于公元前七百年间，有可能稍晚于荷马，但我们知道，荷马的身份面目相当模糊，史上甚而有学者怀疑过荷马史诗是否出自荷马这个人。相比之下，赫西俄德似乎没有所谓的身份问题，因为他在诗中留下了自传性的叙事，讲到自己的父亲和祖籍、和弟弟的财产纠纷，以及他如何成为诗人等等。这些诗人自述的“一手文献”在古希腊早期诗歌中是绝无仅有的。

赫西俄德有两部完整诗篇传世：《神谱》最早系统地记叙了古希腊诸神的统绪，不仅讲到了世界的形成，也讲到了宙斯神族的家世；《劳作与时日》探讨人类世界的正义和劳作。用如今的话说，赫西俄德和荷马的诗作是古希腊最早的宗教经典，最早见证了希腊社会的政教关系，也从某种程度上比较完整地反映了古人对世界生成、神的世界、人类世界的理解和领悟。古希腊的宗教不是崇拜天地山川等自然神（虽然他们也有天神、地神等等），而更多地是崇拜个体性的神，他们是一个大家族，相互之间有感情（亲情、共契、姻缘），更有政治（倾轧、冲突、争辩）。

《神谱》总计1022行，乍读起来似乎内容庞杂，主题跳跃，变换不断，内在关联隐晦玄妙，不少段落意思含混，好些诗句充满歧义，与荷马诗作的明晰显得不可同日而语。对《神谱》这类既具有重要经典地位又看似文意“断烂”的典籍，仅仅有汉译，难免会让读者无从识读，对研究这部经典文本帮助不大，与我国古书一样，必须有注疏才能通读。掌握经典的注疏，其实应与翻译同时进行，否则原典汉译也不一定有所把握。因此，我在翻译的基础上，采编西方学者的研究和注释，尽可能全面地参考了法文英文文献，形式上仿我国古代经书的注疏方式，结合章句、笺注、义疏为一体。这是我进入社科院的第一个课题，得到院里和所里的全力支持。作为上海浦江人才计划课题的结项成果，《神谱笺释》最后在刘小枫教授主持的《经典与解释》丛书出版。全书有三十万字，首先介绍诗人赫西俄德的身世以及《神谱》的主要思想内容和版本流传，其次是完整流畅的原诗译文，仅以脚注形式附随语词考释性注释，最后是尽可能详细的笺注和义疏，以供读者参考。目前我还在用同样的思路整理和译释《劳作与时日》，这个课题也有幸获得了国家课题资助，希望可以越做越好。

2. 院报：能否请您谈一谈您的研究工作主要基于什么样的学术规划？

吴雅凌：我在学校学的是法语和法国文学，在巴黎第三大学完成的硕士博士学位是比较文学专业。但我在宗教所从事研究，目前的多数研究课题从严格意义上应该归在宗教哲学范畴。这与我在求知问学道路上的一些疑惑和心得有关。百年来，西学东渐历史上的诸多前辈学人致力于深入理解西方文明，进而重整中华传统文明精神。但何谓西方文明，

对于中国思想文化界迄今仍然是一个带惊叹号的大问号。众所周知，西方文明有两个源头，希腊文明和基督宗教传统。在法国学习期间，我感到自己在这两个方面有很大的知识欠缺，这与以往所受的教育有关。事实上，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西文明的交会和对话异常活跃，但在了解西方文明时，我们确实比较强调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西方现代文化传统，而相对忽略了西方的古典文明，尤其是一些源头性的古代典籍。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在一些老师的帮助和指导下开始做赫西俄德的翻译和研究。从西方精神源头出发，我还尝试把握西方思想史上的一些关键年代和作者作为研究对象，比如从古代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多神信仰到罗马帝国时期的基督宗教信仰的过渡、法国启蒙年代，乃至二十世纪以来现代西方学者对西方精神传统的反思等等。从前辈学人的经验来看，透彻了解西方的整个文明形态，有助于我们理解和把握中华文明的精神处境和未来命运。即便是纯粹古典研究也绝不是脱离现实的，而应该是帮助我们站在某种高度上看待现实问题。

3. 院报：您具有丰富的国外求学、访问交流的背景，能否请您谈谈学术国际化方面的经验和感受？

吴雅凌：所谓的交流、对话，预设了参与的双方（或多方）是彼此不同的，比如来自不同的生活环境，受过不同的教育和传统熏陶，在某个问题上持有不同见解等等。我本人心智开始成熟的时期，正好在国外读书，因此在这方面有许多切身教训。一切精神文明交流的过程脱不开“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张力。在很多时候，表面看来是认识他者的过程，归根到底是在认识自己（包括个人、民族和国家）。

西方文明里有一个“还乡”的传统，最早源自荷马史诗《奥德赛》，它讲述英雄奥德修斯流浪十年才回到故乡的故事。在特洛伊战争之后，希腊的其他英雄都顺利地回了家，按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们都是成功人士，既有极高的社会荣誉，又能享受天伦之乐。只有奥德修斯历尽艰辛，九死一生。他本来是君王，却家业凋零，妻子几乎要被迫改嫁。我们会说他是很倒霉的。但是，法国十六世纪的诗人杜贝莱写过一首诗，开篇就赞叹奥德修斯是多么幸福，他在外乡漂泊十年，终于可以充满智慧地在故乡做一个更好的人。比起其他人，奥德修斯的优势在于拥有从外乡的交流对话的经历中获得的自知之明，这使得他回到故乡以后处理事情具有了某种“国际化的视野”。

在与有别于自我的他者进行交流对话时，如何既保护自我的个性，又能使这个过程总是公平宽容，尤其是令双方都有所滋养，这不是容易的事，却又是必须时时刻刻努力做到的。我想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也适用于日常的生活言行。

4. 院报：除国际化的学术视野以外，能否请您谈谈其他方面的学术心得？

吴雅凌：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心得。我有幸遇见了很好的老师，耳濡目染严

谨扎实的问学态度。归根到底，我采取了最老实最“笨”的方法，比如解读一个经典文本，那就先弄通每个字句，进而逐步领悟字句之间和段落之间的关系、整部作品的谋篇结构及其与同一作者其他作品的关系，最后搞清楚作者在他（她）的年代发出言说对于我们这个年代究竟有什么意义。如果是做一个调研，我想我也会一样，尽量去亲近、接触和了解每一个相关的调查对象，从他们身上获得启发，再切实找出问题并寻求解答。我参与的几次调研、研修和培训对于我自己了解国情社情、坚定治学立场都有很好的帮助。从事学问探索总是不能避开所谓身份认同问题。作为中国学者，即便是从事表面看似与现实无关的基础学科研究，我们的思想和研究必然要带有时代性和归属感。

就我个人的粗浅经验，学问研究不外乎两个目的，一个是自己从中获得实在的滋养，也许是从历代圣贤的教诲中获得，也许是从现实的人事现象中获得，方式不同，但收获是一样的。另一个目的是有益他人，服务社会，即便一篇看似艰深的学术论文，写作者也要做到心中有读者，这个读者相对而言很可能是少数的，但也许会存在于未来的时光中。

刚才说到“国际化视野”，我想，一种完整的学术视野必须是融贯的，不仅融会中西，还要贯通古今。学问的最大乐趣也许就在于能够和古今中外的贤哲们进行心灵交流，并且这些交流永远对我们所置身的当下充满启发。在当前，所谓的“中西之争”甚至不如“古今之争”这个问题来得迫切：如何对待我们的传统与现代，也就是如何实现我们现今经常谈论的创新，西方为现代性问题头疼了好几个世纪，我们也一样。无论中学西学，必须共同面临这个课题。

5. 院报：您认为青年科研人员的成长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吴雅凌：我很庆幸能够在社科院这样独特的人才培养环境中、在宗教所这样严谨活泼的学术氛围中从事学问研究。做基础研究需要孤独淡泊，忍耐积累，在当前似乎显得“不合时宜”。但正如尼采的经验所显示的，不合时宜的沉思对于一个全速前进的时代也许是必要的，太必要了，这应该就是问学者的使命所在。潘书记曾说，社科院应有“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境界。这无疑也是每个学人梦寐以求的理想和追求。进院以来，我不仅获得了充裕的研究时间，更得到了领导和老师的全力支持和精神鼓励，拥有难能可贵的独立自由的科研空间。与此同时，社科院设立的严格的考评奖励制度和一系列帮助青年科研人员成长的扶持政策，也给我动力和鼓励，使我在研究过程中得到资金、出国访问等多方面的支持，有条件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问学中。

就个人而言，我觉得长远的学术规划很重要。然后就是坚持吧。从某种程度上而言，“研究者”（Researcher / Chercheur）的本意就是“正在寻找的人”，是永在路上的行者。

### 言论

慈善事业承载着弘扬以社会责任、对他人友善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功能。这也应该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衡量慈善事业发展得好与差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即在于能否站在社会责任的文明高地，具有引领整个社会文明向前的意愿和使命，并找到适合当时、当地人们接受文明、友善的价值的途径，使慈善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

——社会学所 周建明

今年物价不会成为大问题。

——经济所刘焯松认为，预计2013年我国CPI涨幅会略超2012年，但物价水平呈现的是温和上涨态势，全年涨幅有望保持在3.5%以下。物价往往是强趋势商品或者说强势消费群体的商品率先上涨的，目前，没有出现强势商品上涨的势头；货币发行量不大；从总供求关系看，我国产能过剩有所缓解，但供大于求的格局仍然是主流，全面通胀的可能性不大。

淘宝和eBay上的反馈评价，使得用户能够了解卖方的可信度，这也为扑灭问题信息的“数字化野火”提供了一种思路。到目前为止，大部分评价系统仍局限于特定网站，所以这种模式的可行性和接受度仍待观察。比较可能的方式是这种评价体系与技术支持相结合，开发能够追溯信息源头的系统，告知信息源是否被多个社群认为是官方的或是可接受的。

——信息所 王兴全

就文化创新而言，弄清楚应该坚持什么、积累什么，才有创新的可能。

——社科报段钢认为，“创新”一词是积极的，但是一味泛化创新，就容易离开其本意。创新不是凭空呼喊的，而必须是有根据、有来源的创新。文化的积淀需要时间，文化硬件可以建设，但文化的精髓不是建设出来的，而需要在长期积累中形成。文化贵在坚持，在坚持中积累，这就需要时间。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当“合力”出现时才有创新的可能。

近十年来，上海正在成为世界级城市之一。借鉴美国、日本等国成功经验，文化创意产业是文化产业发展发展的关键因素，为推动上海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青年最具创新力和创造力，理应成为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的生力军，积极参与文化科技创新三年行动计划，为上海实现“创新驱动、转型发展”贡献智慧。

——文学所 花建

新兴经济体中的大都市，不仅成为该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也对世界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世经所苏宁表示，在全球经济复苏不确定的时期，新兴市场都市区依然继续崛起为生产、消费和贸易中枢，2007年—2011年，发展中国家的大都市基本保持了就业与经济收入的增长趋势，而发达国家大都市则不断退步。这种情况集中体现了新兴经济体利用全球化发展自身，并对国际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重要趋势。

## 游阳明祠随想

夏金华

贵州地处我国西南边陲，为古代所谓夷蛮之乡也。文明落后，民风质朴。其境内有书院之设，始于修文；修文之有书院，始于龙岗；龙岗之有书院，始于阳明。阳明对黔之贡献，由此卓然可见。

龙岗，乃一小丘，笼罩在晨曦之中，好像是一尊盘卧于平地之上的“潜龙”，悄无声息，“明入地中”，作“以待天时”之状。在“天下之山，萃于云贵”之区，有此小丘，确属罕见。

到得近来，但见山中古木参天，浓荫蔽日。相传为姚江得道之处的“阳明洞”，就坐落于半山腰间。洞穴天然生成，不大不小，外面蓝天白云，里头滴水有声，既适于天马行空的思想驰骋，也可沉潜于万顷碧波之下，犹如置身于大千世界之外，自在乎？深邃乎？端在一念之间。故而，此洞更像是高道修炼的洞天福地，也不逊于古天竺瑜伽行者长坐的石窟。洞之旁，有阳明手植柏树

一株，虽经几百年风雨，依然高耸挺立，郁郁葱葱。

这般所在，在吾等肉眼凡胎看来，仿佛是上苍在冥冥之中为阳明准备的，有如《西游记》所说，唐僧西行求法所经之“九九八十一难”乃释迦佛预设一般，天衣无缝，以考验其心志，而成就万世之名。但事实终究没有想象来得美妙，玄奘策杖孤征，九死一生，始达印度。复经苦学十数载，方得载誉以还；阳明因上疏救戴铣等人，得罪宦官刘瑾，被贬为龙场驿丞，环境险恶，乡关万里，幸得苗彝护佑，才免于劫难，且有“龙场大悟”的一刻。“潜龙勿用”，韬光养晦，形象地概括了在黔三年阳明的艰难时世。其寂寞孤独，凄凉萧瑟之情，由于为不知名的旅人之死撰写《瘞旅文》而喷涌出来——

连峰际天兮飞鸟不通，游子怀乡兮莫知西东。莫知西东兮维天则同，异域殊方兮环海

之中。达观寓离兮莫必予宫，魂兮魂兮无悲以恫。

悲愤感慨，长歌当哭，哪有后来地方官所书“培养元气”、“天地常新”和“大启文明”之类的匾额，以及游人信手涂鸦一般轻松洒脱！

治中国哲学者，目光所及，往往落在“内圣外王”之道上，所谓莘莘大者也。此固然不错，无论是修证境界的自身受用，还是有功于江山社稷，或通而论之，文武韬略均臻于佳境者，阳明自是当之无愧。此等人物，在我华夏民族的儒林榜中，并不多见。因而名垂青史，良有以也。

若以佛家境界推之，阳明所悟之果位，尚不足论。因阳明学实以借禅宗之“瓶”而装儒学之“酒”，然由于瓶内残存之禅学味过于浓厚，阳明本人尚能“调剂勾兑”，应付自如。如其“四毋”说，不过出于南宋以来禅门流行“默照禅”之启发；而“天下无不可化之

人”或“满街都是圣人”之语，亦恐与“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皆能成佛”之说，脱不了干系；所著《朱子晚年定论》，颇存禅宗“简静”之迹。……但其始终把握“经世致用”之舵不动摇，故能守住儒学门庭，并光大之。如此判断，亦可从王门后学的变故中得到佐证：

一如左派后学，自王艮、王畿始，已渐显把持不住之态，黄宗羲所谓“阳明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可谓一语道破天机。至颜山农、何心隐，直至李贽，演变为“狂禅”，大有斩龙伏虎、掀翻天地的气势，然终因难容于世俗人伦，而将自己送上了不归之路。

一为右派，从钱德洪以下，中经罗洪先，至刘宗周，则致力于清理门户，销除杂味，包括装酒之“瓶”，发展出“醇儒”来，重回孔门圣学的正轨。

由此，我们不难窥见姚江学派的本质所在。

当然，阳明学的遗产尚不止于此，后世坚定奉行其“知行合一”论者，大有人在。最典型的，莫过于清代之曾国藩，惟因其理论造诣所限，难以企及阳明之境。还有民国的蒋中正，尝三度拜谒“阳明祠”，并亲笔题写“知行合一”四字，刻于石。

王文成公祠，在阳明洞上方。青瓦白墙的院落，尚在修缮中，除若干断碑残简外，空空如也，倒也符合昔日主人行禅大悟的宗旨。祠中新立阳明为龙岗书院手书《教条示龙场诸生》木匾一方，尤为醒目。文章训示，重在四事：曰立志，曰勤学，曰改过，曰责善。流风所及，成为转变异俗、提升文明之助力，亦阳明有功于黔民之一者。

是时，丽日中天，万木争荣，三五游人，出没于洞穴、石径和草木之间，斑驳陆离。

（作者系哲学所研究员）

## 告别民厚里

孔海珠

上海的旧房成片的拆建已不是件新鲜事，可那天坐车经过延安中路铜仁路口，看到沿街的墙上连续写着大大红色的“拆”字，心里还是咯噔了一下。按理说，这样的老房子建了近八十多年了，早就该拆了。记得四年前夏天的一大早，我陪两个日本人来到这条里弄考察。前夜一场暴风雨过后，马路上的积水早无影踪可寻，可是一踏进这条里弄，却是另一番景象。高高的积水无法排去，使清晨的繁忙都在哗啦哗啦的水声中进行，许多主妇和老人们一边捣鼓着脏水，一边嘴里不断地叫骂。看见我们几个手拿相机的闲人，以为是报社来采访。于是，围着我们说开了。总之一句话：房子太老，条件很差，再也不想在这儿住下去了。如今，他们的愿望实现了，可是在我的心头却生出了一丝留恋。

民厚里，如今的慈厚里，谈不上是古迹，却很有名气。以前，它

是哈同(1847-1931)的产业，犹太人在上海发了迹，在当年无人居住的沪西近郊买了一块地，用三分之二造了一个哈同花园，另外三分之一由他的管家姬觉弥造了二片石库门的中国式里弄。他们会很算计，建造一所花园，需要很多工人，也需要供给工人生活的住房，附近新建的单位职工也需要住房，作为一项投资，他们在花园左侧建了这片住屋。

前面从福煦路(今延安中路)，后到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左从哈同路(今铜仁路)，右到赫德路(今常德路)，占地一大片，中间留条安南路(今安义路)，把民厚里一分为二。南面的七条弄堂称民厚南里，北面的五条弄堂称民厚北里。这片里弄造好以后，果然吸引了不少工人和附近的职工。常德路电车场的职工，静安寺路中华书局编译所和印刷厂(现上海商城)的职工，上海大学1924年2月从青云路搬到西摩路(今

陕西北路)公共租界后，他们的学生也有部分住进了这里。由于居住人口的激增，店铺，小菜场也纷纷在附近开张，不少农家也赶到这条并不长的安义路上设摊卖菜。这块地段逐渐繁荣起来，使地价和房租当然也按比例高涨。这种投资开发的成功，对哈同来说，建造哈同花园就不仅仅是单纯的消费和享受了。

据说有这样一件事：哈同经营地产的初年，他经常自己带了一个雇用的中国孩子，到处收房租。态度非常和蔼；但谁要短他一个钱却不行。有一处里弄口摆皮匠摊的人，每月付地租五元，他每次老是很快活的拍拍那皮匠的肩胛，对他讲“发财，发财”。“发财”这两个字，也就是哈同唯一常用恭维中国人的中国话。可见他的精明和事必躬亲。

这条里弄的有名气，还在于它住过不少文化名人、历史人物。中共上海党史记载：1920年5月5日毛泽东第一次由北京到上海，即寓于哈同路民厚南里29号(今安义路63号)，从事驱逐湖南张敬尧的宣传，并和陈独秀讨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的问题。到沪后的第三天，即与旅沪的和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在半淞园举行会议。可以想象，来沪后毛泽东的活动都从这所房子出发，并在这所房子里写下了历史的重要篇章。

在这条里弄，曾有过重要的文学社团，出版社社址，曾发生过许多历史故事，文坛趣闻，社团风云。有的人物就此消声匿迹，有的登上革命征途，有的发生信仰危机，有的吵吵闹闹各分东西。这里曾演绎过的一幕幕历史，一场场悲喜，一个个人物，引得中外学者探秘、索古、查考。我和二位日本朋友也是其中之几个。

经查考，现今九十一岁高龄的施蛰存先生是民厚里最早的居民之一，他曾二度在民厚南里、民厚北里住过。据施先生文章中介绍，他在上海大学就读时，和同学戴望舒住进了这里，原因是这里离学校近。我想还有一个原因是这里虽地处那时的沪西近郊，却有不少文化人住在这里，并不寂寞。施先生在这里认识了在中华书局编译所工作的田汉、张闻天、郁达夫等。当时田汉是上海大学中文系的兼职老师，刚和夫人易漱瑜从日本回国，在中华书局当编辑。虽已出版《三叶集》一书，但初登讲台，还不老练，讲

授西欧浪漫主义文学，没有教材。由于同住一条里弄，打听了一下，当晚他便和戴望舒去串门拜访。那时，施蛰存和戴望舒才二十来岁，然而，第一次拜访田汉老师的家，却留下了深刻印象。时间已跨过了一个甲子，施先生在《南国诗人田汉》一文中，还能清晰地记述那时的情景：

“有一天，我和戴望舒打听到他的住址，当晚就冒昧地去串门拜访。他住在民厚北里一幢房子的楼上。室内家具非常简单，只有几件生活必需的器物。田老师看见我们上楼，一边热情地招呼我们，一边赶紧去床边放下帐门，原来田师母漱瑜身子不舒服，已经上床睡了。我们很后悔来得太鲁莽，可是田老师却满不在乎，坐下来和我们聊天，绝没有憎厌的样子。”

还有趣的是，他们刚搬进民厚北里的一间后厢房，只听见隔了板壁有一伙人在吵吵嚷嚷地谈话，仔细一听倒蛮有意思，是国家主义派的一群人在争辩。有左舜生、田汉、曾琦等。他们那时编辑出版《醒狮周报》，这前厢房就是他们的社址，房主是左舜生。由于误入此地，夜夜听隔壁，于是，也认识了国家主义派的一群人。住了半年不到，他们搬到民厚南里，又组织了创造社一群人。

文学社团要依托出版部门的支持，而出版书商也要靠文化人来打牌子。1921年8月郭沫若的诗集《女神》作为《创造社丛书》第一种由泰东书局出版发行，《创造季刊》、《创造周报》等也通过泰东书局相继问世。泰东书局成了创造社的大本营。所以，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人从日本回国，都落脚在泰东书局编辑所。1922年当书局从马霍路(今黄陂北路)德福里320号移到民厚南里(今延安中路1238弄9号)，印刷所也设在哈同路民厚南里东5弄121号(今延安中路1238弄121号)。这样，创造社的同仁大都居住在这栋一楼一底的石库门房子里。把它称之为创造社前期活动点，有史迹价值是不为过的。记得在纪念郭沫若诞生一百周年

的时候，郭老的哲嗣郭博先生带领我们一群参加学术讨论会的同志，曾到这里来考察。他向我们讲述亲身的感受，儿时的情景，我们只有通过他实地讲授才会有的一种历史的亲近，难以忘怀。

那时，张闻天也住在这条里弄内，他是中华书局编辑。我父亲孔另境(令俊)和张闻天的弟弟健尔很熟，又是上海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来到这条里弄，找健尔，也找施蛰存、戴望舒。施先生在《怀孔令俊》中说，“因此，我们由令俊的介绍，认识了健尔，又因此认识了张闻天，那时他正在译俄罗斯作家科洛连珂的《盲音乐师》”。

在民厚里住过的文化人还有不少，石库门里的故事肯定很多。前几天，我和妹妹去看望施老伯，他还讲起，近民厚南里常德路上有家小酒店，住在这条里弄里的文化人常去那里小吃，他和戴望舒也去，那里的菜烧得不错。记得张闻天最喜欢点的菜是香拌芹菜，每餐少不了。田汉、郭沫若、郁达夫等人也常去那里。有一次，郁达夫还喝醉了酒，在马路上一躺了一夜。这样的老古话，大约也只有施老伯才知道了。

哈同花园早就拆了，建了一座上海展览中心，为广大人民服务。民厚里也正在拆，在轰隆一声中倾刻倒塌，那么，那里曾经发生的故事是不是会随之消失呢？建房部门会不会留下这条旧里弄的图片资料以备查考呢？文管部门应不应该抓紧调查取证以丰富上海文化史迹的宝藏呢？上海是有历史的城市，是海纳百川的城市，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汇的城市，也是一座非常具体的钢筋混凝土建筑的有形城市。怎么体现这许多价值呢？民厚里是有代表意义的。我们希望当上海旧房拆建的同时，有更多的部门关心它，作一番史迹调查，留一份可视档案，甚至在新房建成时候，在适当的地方镌刻一段段文字，记录它过去的历史，使后人知道更多上海的历史和文化。只有这样，每当一幢幢“新慈厚”崭新的耸立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会毫无遗憾地告别它的过去。(作者系文学所副研究员)



▲“皛皛新妆玉有辉，自在小鸟语声娇” 作者 陈晓华